

“西諦藏書”概述

朱家濂

王樹偉

“西諦藏書”即文化部前副部長鄭振鐸先生的藏書。鄭氏自署藏書印為“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”，所以簡稱為“西諦藏書”。

鄭先生在一九五八年因公殉職以後，他的家屬即秉承他的遺志，把他的全部藏書捐獻給政府，當時文化部根據他的家屬的意見，指定北京圖書館負責接受這一項收藏。全部圖書，包括中文、外文共計一七二二四部九四四四一冊份。接受以後，即由北京圖書館辟設專室保藏，經過初步整理，已自一九六〇年起開始供應科學研究者參考。鄭先生的藏書久已為學術界所重視。這一項寶貴的收藏能夠化私為公，是學術界的一件大事。很多讀者迫切要求知道“西諦藏書”的內容，茲就整理過程中粗粗知道的一點表面情況，作一個簡單的介紹。

鄭先生搜集圖書的範圍是相當廣泛的，概括地分析，其中以我國古籍占絕大多數，而古籍中又以文學藝術方面的書為主。他用了畢生的精力從事圖書的搜集，才能積累下這一項豐富的收藏。在一部鉛印“古今文綜”的題識中，鄭先生寫了一段深刻動人的話。他說：“一九一五年予在溫州十中肄業，此書方出。一陳姓同學購得之，予欣羨無已，乃假得之。窮一暑之力，盡錄其中論文之作，集為二冊，題曰論文集要，殆是我從事纂集工作之始。今經四十餘年矣，此二冊鈔本尚存行篋。頃過中國書店，見架上有此書，乃購之歸，以紀少年時代一段艱苦求書的事實”。鄭先生一生正是本着這種堅強的精神，從事圖書資料的搜集。

鄭先生雖然擁有這樣一項巨量的圖書，但是他對圖書的搜集，並不是只圖插架之宮，無目的的濫收。他的藏書是隨著他對學術研究的領域不斷擴大而不斷充實的。換句話說，他的藏書是隨著研究的需要有重點地進行補充的。大家都知道，鄭先生在戲曲、小說和版畫等方面收藏非常豐富。的確，這幾類書是“西諦藏書”中的重點，罕見的善本書籍也大部分集中於此。另外，他對俗文學中的佛曲、彈詞、魏晉六朝及唐人文集、清人文集、明清史料、考古等方面的收藏，也都各有獨到之處。茲分述如下：

一、戲曲

鄭先生的藏書，戲曲資料占的比重很大。他自己也說：“予弱冠即好收書，歷三十年所得所見不下二、三萬種，就中以詞曲為多”（“清輝閣批點玉茗堂還魂記”跋語）。他對明清兩代刊刻的雜劇、傳奇、散曲的搜索極費苦心，經過三十多年的慘淡經營，已經成為一個了不起的專藏。即以“西廂”一書的明刻本而論，先後就羅致了十四、五種之多，其中如黃嘉惠本“董西廂”，李卓吾批點“西廂記真事”，萬曆刻王驥德校注“古本西廂記”，凌蒙初朱墨套印本“西廂記”等，都是絕不經見的版本。“琵琶記”一書也收有玩虎軒刻本、陳大來重刻嘉靖本、凌初成刻朱墨套印本、容與堂刻李卓吾評本，魏仲雪批點本等，諸本刻印均極精整。玉茗四夢的“還魂記”，明代刊刻流傳為數較多。在“西諦藏書”中“還魂記”既有萬曆的原刻本，又有冰絲館本所根據的清輝閣批點本。還有明萬曆刻本“女貞觀重會玉簪記”一書在西諦曲藏中是鄭先生一生最得意的一部傳奇，鄭先生在此書跋語中說，“三十年夢魂相思，終得有之”，足見珍重之至。此外，明刻傳奇雜劇罕見的版本不勝枚舉，古本戲曲從刊中所影印的，不過是其中的一部份，但已使我們了解到西諦曲藏的豐富。至於清代戲曲的搜集，也是超越前人的。即以清代雜劇而論，早在三十年前鄭氏所收就已达二百數十部之多，比王國維先生曲錄超過三倍。鄭先生即以這一項收藏為基礎，連續出版了“清人雜劇”的初集和二集，三集四集也做了準備。這一項罕見資料影印問世，當時就受到文學藝術界極大的重視。人們對於鄭先生所編“清人雜劇”和臧晉叔“元人百種曲”、沈林宗“盛明雜劇”同樣看待，承認它對中國文學史料的供給，具有偉大的功績（見趙景深“讀曲隨筆”）。鄭先生所藏散曲，也有不少精舊之本。如“詞林逸响”、“彩筆情辭”等書，都是明刻散曲的翹楚。尤其是明萬曆刻初印本“南北宮詞紀”一書，鄭先生費了將近三十年的功夫，先後收集殘本八部之多，才湊成這部初印完整的明代散曲名著。在這裡我們還

必須提出一件事情，就是“西諦藏書”中還有一部鄭先生稱為惊心动魄的明藍格抄本“錄鬼簿”，這是一部研究元明兩代文學史最重要的史料，也是幾經周折，前後歷二十餘年才歸入西諦曲庫的。

二、小說

明刻小說不如明刻傳奇流傳之多，萬曆本已少，嘉靖本更稀如星鳳。而“西諦藏書”中，小說的搜集也燦然可觀，是次於戲曲的一項有系統的專藏。明刻小說中，嘉靖本“忠義水滸傳”殘卷（存卷五十一至五十五）是西諦所藏說部的冠冕。還有嘉靖本“清平山堂話本”二種，雖然殘缺不全，鄭氏也視同珍璧。其萬曆及萬曆以後的版本如“皇明英烈志傳”、“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”、周氏大業堂刻“唐書志傳通俗演義”、“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國志傳”、“類纂皇明新故事”等等，也都是很難得的版本。清刻小說如順治本套印李漁評“三國志演義”、汪象旭原刻初印“古本西游證道書”、“馬再興七姑傳”、程甲本及程乙本“紅樓夢”、“北魏奇史閻孝烈傳”、“鴛鴦影”、“鴛鴦會”、“宛如約”、“雙奇夢”、“風箏佩”等書，均應列為說部上乘。

清末民初石印鉛印小說搜羅的豐富，是西諦所藏說部的特色之一。尤其可以補北京圖書館藏書之缺。這類書籍每每被人忽視，認為無足輕重，其實很多鉛印石印小說現在已不多見。而且積累達數百部，蔚成大觀，做為小說研究的資料，是說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
三、佛曲、彈詞和其他俗文學

佛曲和彈詞，都是民間文學的優秀傳統，但在過去是不登大雅之堂的。三四十年來，對於這一項文學遺產的倡導和發掘，鄭先生盡了最大的努力。三十年前，鄭先生在杭州、上海、蘇州、揚州的書攤和善書坊中搜羅了大量無人過問的彈詞和寶卷，奠定了“西諦藏書”中佛曲和彈詞的基礎。鄭先生就根據他所搜集的這兩項資料，發表了“佛曲彙錄”、“彈詞目錄”，第一次把這兩類俗文學介紹給廣大讀者。

後來，鄭先生在北京又得到不少明代萬曆年間和清代順治康熙年間所刻的“梵夾本寶卷”，其中最重要的有明寫本“目蓮救母寶卷”、“銷釋真空寶卷”等，就現在所發現的資料來看，可以說是明代寶卷中最早的本子。彈詞的補充後來也收得不少的精品，像“再生緣”、“珍珠塔”、“芙蓉劍”、“鐵蓮花”、“嬌紅傳”、“明珠記”等，都有了精舊的鈔本。一九

三八年間，鄭先生又根據這些資料写下了他的“俗文學史”的有关部分。

四、版 画

版画在“西諦藏書”中是最引人注意的一部分，範圍也非常廣闊，從五代、宋、元直到清末，真算得起是無美不備，在過去公私收藏中是數一數二的。

鄭先生在三十年代開始搜求明代版画，初期只是注意小說戲曲的插圖，後來推廣到畫譜及其他藝術類的書籍，更進一步上溯宋元，採集了宋元兩代以及明初刊印的出相佛道經典。同時，傍征博引，囊括了各門各類的有圖的書籍。鄭先生所編“中國版画史圖錄”，相當大的一部分都是出於自己的收藏。從現存的圖籍來看，五代所刻“文殊師利菩薩像”，宋元所刻“磧砂藏”扉頁的佛象等，都能代表我國版画早期作品的風格。明代版画更是西諦所藏版画中的精華所在，舉凡建安、金陵、新安名工所鐫，都有極其精湛的代表作品。傳奇如萬曆本“玉簪記”、李卓吾評本“琵琶記”、富春堂刻本“鸚鵡記”、燈語齋刻本“兩紗記”、萬曆本“目蓮救母勸善戲文”等書，散曲如“詞林逸响”、“彩筆情聲”、“青樓韻語”和萬曆本“南北宮詞紀”，傳記如“帝鑑圖說”、“人鏡陽秋”，釋道如“仙佛奇踪”、“仙媛紀事”，彩色套印的如“芥子園畫譜”、“十竹齋畫譜”、“程氏墨苑”、“十竹齋箋譜”等書的圖版，都是研究版画的重要資料。此外，明清著名畫家和木刻家合作的作品如明陳老蓮的“水滸叶子”，清蕭云從的“太平山水”、“離騷圖”等，也是極不易得的珍貴圖籍。

五、考古美術

“西諦藏書”中這一方面的資料的特点是，古今中外兼收并蓄。中文考古的書籍，無論新舊，凡有金石、藝術、譜錄各類的書，都在搜羅之列。近幾十年出版的有關考古藝術的書，更為完備。日本和英法等國出版的考古美術書籍，搜集也非常豐富。其中日文一部分尤其值得注意，不少較早時期出版的如“唐宋元名畫集”、“明清名畫集”、“白鶴帖”、“藝苑心賞”、“南宋名畫苑”、“泉房清賞”、和較近出版的“支那建築”、“支那建築裝飾”、“熱河”、“鳴沙余韻”等書，目前國內很多大圖書館也不具備，這些資料都是考古藝術研究的重要參考書。而且像上面所列举的大部份都是有限版本，在今天已經是很不容易得到的圖籍。

六、清代詩文集

鄭先生收清人文集較晚。他在所編“清代文集目錄”序文中說：“收書始於詞曲、小說及書目，繼而致力於版畫，遂廣羅凡有插圖之書，最後乃動博取清代文集之念”。當時鄭先生選的标准是只收文集不收詩集，他重視清代文集有兩點理由：第一，重視史料；第二，重其考訂經子金石文字之作。他在清代文集里面還着重收嘉道兩朝朴學家的文集。今天檢閱“西諦藏書”中，文集已超過千部，但詩集也有不少，可見建國以後，範圍又有所放寬。

七、魏晉六朝及唐人詩文集

鄭先生在建國以後方才動手收集魏晉六朝及唐人詩文集。他對六朝及唐詩的研究，是有着宏偉的規劃的。鄭先生曾說：“研討唐詩刻本是一大學問，非廣搜異本，多集資料，不易有可靠的總論”。（見“高常侍集”跋語）由於鄭先生的銳意經營，幾年以來已經有了相當豐富的積累。明代匯刻六朝人的集子如汪世賢、張燮、張溥、薛應旂諸刻，都已具備。“玉台新詠”也收有前人目錄所未載的嘉靖仿宋本。“西諦藏書”中宋元本很少，而“陶集”却收有宋本。“蔡中郎集”則有徐子器本、余汝成本和茅一相本。唐人詩文集集中的初盛中晚各期名家，約略具備，其中也不乏善本。當然，鄭先生在這方面的收藏，雖然已經奠定基礎，但還有待於繼續充實。如果鄭先生不死，它的发展是能够想像的。

（上接第15頁）

第四，鄭先生在甄選圖書時，目光是那样的敏銳，識見是那样的果斷。看他的題跋中所談，書店每到一批書，他都能迅速地從里面選出較好的書。往往在亂書堆中，得到極不經見的版本。如他在明萬曆本“唐入選唐詩六種”的題跋中說：“此書雜皮亂書堆中久無人過問，一旦脫穎而出，大是慶幸”。這一方面說明鄭先生在得一本好書以後的喜悅心情，一方面也更說明他對古籍的鑒別能力。

鄭先生遇到好書，往往能够很快地作出決定，毫不猶疑。如“紡授堂集”的題跋中說：“帶經堂從福建購來，我一見即收之，故價乃奇昂”。“天章匯錄”的題跋中說：“是活字本，甚罕見，予翻閱一過，即挾之以歸”。“玉台新詠”的題跋中說：“帶經堂從

八、明清史料

鄭先生對於明代史料的搜集，也很注意。如明藍格抄本“孤樹哀談”，是研究明初歷史的重要文獻。明刻本“歸德府寧陵縣士民疾苦條陳”，是反映明末農民遭受殘酷剝削的真實紀錄。明刻本“長安客話”是考証北京歷史的罕見資料。十餘年來，鄭先生收集的明代叢書里面，也蘊藏着不少史料。另外，“西諦藏書”中還有不少坊間編刻的日用小叢書，如明雅堂刻黑口本赤心子匯編“四民利觀翰府錦囊”、萬曆本鼎鐫十二方家參訂“萬事不求人博考全編”等類型的書，鄭先生也是準備“作一綜合研究”的。

清代史料的收集，鄭先生的目的是“收其較罕見及記述較確實者”（見“劫中得書記”八十四“請纓日記”跋語）。“西諦藏書”中，關於鴉片戰爭、中法戰爭、中日戰爭、義和團運動的資料，都有所獲。此外，在近代文化史上，也收得極可珍貴的資料，如道光刻本“日月刻度通書”，是僅見的第一部中西合璧曆書；又如咸豐七年上海墨海書館鉛印本“六合叢談”，是西洋印刷術傳入我國後現存最早的一部鉛印書。其他如咸同年間倡導西學的通俗科學譯著，也是我們研究西學東漸的重要參考資料。

除上面分別介紹的各種藏書以外，其他如宋元明清各代的詞集、各家書目、明清叢書等，在“西諦藏書”中亦均占有一定的地位。此外，鄭先生還非常注意明清兩朝活字版的收集，罕見的本子也不在少數。總之，“西諦藏書”的特點很多，有待於我們進一步研究，這篇文章只是就涉獵所及，初步地加以概括報道而已。

廣東購書數百種，中有此書，予一見即收之，雖缺……無傷”。“石倉文選”的題跋中說：“來熏閣從鄧大酉山房林集處得之，一見即驚為秘笈，亟挾之而歸”。這些例子都說明鄭先生的卓識定見。我覺得這是我們圖書館從事採訪工作的人所應該深刻體會的。鄭先生懂得这么多的東西，有這樣豐富的知識，並不是什麼神奇的事情。而主要是由於他對學術領域的接觸一天的比一天廣，對目錄學的知識一天比一天深，對版本的辨別能力一天比一天高，所以一見好書，就能當機立斷。我們作圖書館工作的人，今天有很好的條件，如果自己不勤學苦練，年復一年，依然故我，而空嘆水平不夠，這是不能諒解的。我自己就是這樣一個類型的人，讀了“西諦藏書題跋”，給我增加了奮鬥的力量。